



民国时期武术是怎样被书写的?

陈保磊, 王 岗

How Was Wush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ritten About?

引用本文:

陈保磊, 王岗. 民国时期武术是怎样被书写的? [J]. 上体育大学学报, 2023, 47(9): 43–51.

CHEN Baolei, WANG Gang. How Was Wush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ritten About? [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2023, 47(9): 43–51.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6099/j.sus.2022.06.12.0001>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民国时期“加油”的词义演变考——以其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为中心

Semantic Evolution of "Jiayou" and Its Use in Spor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12): 71–76

术道并进: 中华射艺的价值审视与定位反思——兼评《学箭悟禅录》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 and Tao: Rethinking the Orientation and Value of the Chinese Art of Archery—Comments on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4): 26–34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的生存状态及启示——基于中国武术家群体的口述史分析

The Existence of Wushu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An Study on the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Wushu Artists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7, 41(6): 83–89

对接“国之大事”的武术发展战略调整

Strategy Adjustment of Wushu's Development Joining the Affairs of State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2(6): 51–56, 63

中央国术馆馆刊及其社会功能

The Central Guoshu Institute Periodicals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s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9, 43(2): 115–121

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的产生、发展及启示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National Chinese Normal College of Martial A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2): 87–94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专题探索

民国时期武术是怎样被书写的?

——基于 1911—1949 年出版著作的统计分析

陈保磊^{1,2}, 王 岗^{1,3}

(1. 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 中国计量大学 体育军事部, 浙江 杭州 310018; 3. 武汉体育学院 身体行为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以 1911—1949 年出版的 246 部武术著作、156 名著者为史料, 运用数理统计法, 从图书分类、出版趋势、作者组成等多个方面对民国时期中国武术学术发展状况进行剖析。民国时期武术著作直观呈现出“出版数量受到时局变化的影响, 并以上海为中心汇聚核心出版单位, 社会文化学者为主要核心作者群”的特点。在中西新旧冲突与融合的学术背景下, 中国传统武术及明清武术理论浸润学人, 出版了大量关于“拳种”“拳理”以及考证武术源流的著作, 延续了明清武术著作的书写传统, 并根据时代需求扩充新内容; 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 “科学”与“民主”又成为民国时期武术书写的主题, 借鉴和参照西方体育的研究方法成为新的学术特征, 深刻影响了中国武术的学术发展。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武术著作; 国术; 学术特征;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3)09-0043-09 **DOI:** [10.16099/j.sus.2022.06.12.0001](https://doi.org/10.16099/j.sus.2022.06.12.0001)

20世纪90年代, 以林伯原^[1]、易剑东^[2]、马明达^[3]等学者的文章为始端, 开启了民国时期武术研究, 沉寂一时的民国时期武术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 30余年来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整体而言, 民国时期武术研究在整个武术学术体系中所占比例并不高, 而且大部分学者的研究依旧集中在民国时期的武术教育^[4]、中央国术馆^[5]、精武体育会^[6]、武术与政局的关系^[7]以及代表性武术人物^[8]等方面, 对于民国时期武术的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分析关注较少。

在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欧美的各种新学相互争长竞短, 由此涌现出形形色色的学术群体。在此背景下, 武术被改称国术, 被裹挟在不同的文化、思想、主义、立场之中, 成为不同学术群体的利器, 或批判, 或褒扬, 或守旧, 或改造, 由此造就了民国时期武术发展的多样化, 这也正是当代学者从多视

角研究民国时期武术的历史基础。由此而言, 与其说今天出现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术热”, 不如说是民国时期武术的“历史热”。譬如, 一提到民国时期武术, 人们就会想起民国时期的武术大师, 忆起他们的传奇经历、逸闻趣事, 但民国时期武术真正的学术价值是其反映了中国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

葛兆光^[9]言:“真正的学术史, 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 谈王国维, 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 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同理, 论及民国时期武术学术, 如孙禄堂, 也应该讨论他的《太极拳学》《形意拳学》《拳意述真》等著作, 而不仅是他的武林轶事。这些恰恰是当代学者在民国时期武术学术研究中忽略的部分。即便有学者^[10]进行了相关梳理, 但在文献的收集或选择上不够详尽, 对

收稿日期: 2022-06-12; 修回日期: 2023-05-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043)

第一作者简介: 陈保磊(ORCID: 0000-0003-0814-0860), 男, 山东济宁人, 武汉体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武术文献史、学术史, E-mail: cbl311@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 王岗(ORCID: 0000-0002-2627-5788), 男, 山西运城人, 武汉体育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武术文化与发展, E-mail: tywanggang@126.com

文献的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刻。因此,为更加客观、真实地描述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术特征,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主要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以下简称《总书目》)所收录的武术著作,并补充相关文献^①所提及的著作,尽可能通过详尽的史料,从学术史视角系统地对民国时期的武术著作及著者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全面探究民国时期武术的学术特征和学术价值。

1 民国时期武术著作出版概况

《总书目》是一部大型回溯性书目,收录了从1911年到1949年9月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目录以

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藏书为主,并补充少量其他图书馆藏书,基本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我国中文图书的出版面貌。《总书目》按学科分册,其中“教育·体育”分册将体育分为体育理论、世界各国体育事业、运动场地与设备、体育运动技术这4类,收书九百余种^[11]。“武术及民族形式体育”收录在“体育运动技术”类别,分为“中国武术理论、方法、规则、体育组织、国术史、拳术、器械武术、武术攻防、武术气功、其他民族形式体育、各国民族形式体育”11个分支,共计收录武术著作246部,其中个人编著219部、组织编著27部。具体统计情况见图1(此图只统计了235部有明确出版年份的武术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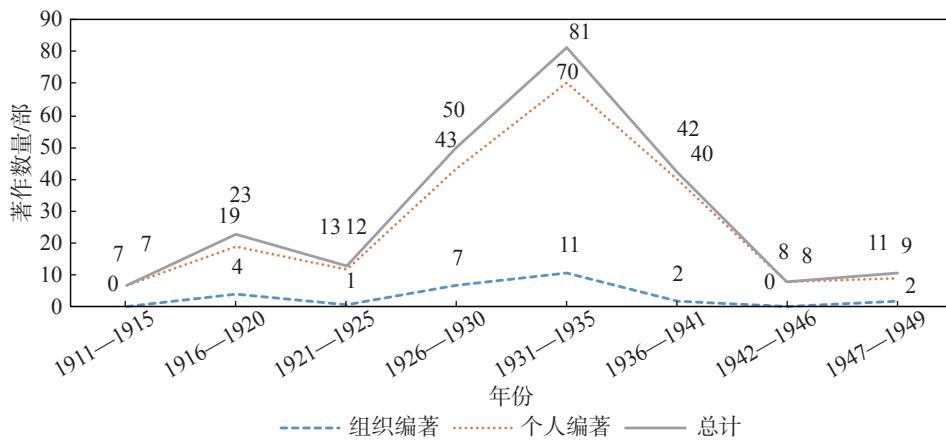


图1 1911—1949年武术著作出版数量统计

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the number of martial arts works published from 1911 to 1949

1.1 图书出版数量与时势变化具有关联性

欧阳哲生^[12]指出,“民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报刊、书籍等作为学术的重要载体、舆论的传播媒介,自然受到政局变化的影响。从图1时间与数量的变化曲线也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武术图书出版数量与政局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1)第一个阶段(1911—1915年)。这5年共出版武术著作7部(其中2部为译著),年均1.4部,是民国时期出版著作最少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出版著作数量少,主要是因为民国初期虽然政治体制有变,但在思想观念乃至文化制度层面延续者多、断裂者少。清末“停罢武科”,武术在人才选拔制度上失去了优势,如马良^[13]言:“社会人民,凡欲以武取功名者,因科举已废,遂多改事他业。故各省各处之武学馆,亦列入天演之淘汰。”而且受“庚子事变”的影响,民间习武也受到清政府的严格管制,武术的发展趋向衰微。所以,陈

公哲^[14]感叹道:“及至清末,火器大行,拳术从此废置,若不转移功用,行将消失。”由此而言,民初武术的发展延续清末态势,仍处于低迷状态,图书出版数量甚少。

(2)第二个阶段(1916—1925年)。这10年共出版36部武术著作,且仅1916—1920年就出版23部,年均4.6部,形成了民国时期第一个出版高峰期。该阶段武术图书出版数量的增加,主要因为此时处于“北洋军阀时期”(也称“军政时期”),政体实行军政府统治,世处乱局,战争频发,武事受到重视。1917年,以马良主编出版《中华新武术拳脚科(上编)》和《中华新

^①包括《中国武术百科全书》(1998)、刘彩霞的《百年中文体育图书总汇》(2003)、乔凤杰的《中国古代武术项目志》(2017)、《中国体育史》(1994)、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的《中国武术史》(2003)、周伟良的《中国武术史》(2005)、邱丕相的《中国武术史》(2008)、郭玉成的《中国武术史》(2019)等图书,以及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中国近代图书全文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收录的文献。

武术卒角科(上编)》为始,迎来了中国武术著作的出版热潮,孙禄堂、朱鸿寿、王怀琪等陆续出版8部著作。总体而言,在马良、许禹生等人的参与以及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北洋时期武术得到了快速发展,改变了清末民初武术“行将消失”的危险处境。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复辟势力鼓吹“新武术”制造反对民主思想的舆论^{[15]331},宣扬封建复古思想,引起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和抨击,这对武术在青年人群中的传播产生了消极影响。

(3)第三个阶段(1926—1935年)。这10年共出版131部武术著作,年均13.1部,其中1931—1935年是整个民国时期出版的顶峰时期,共出版武术著作81部(个人编著70部,组织编著11部)。该阶段之所以能形成武术著作出版的顶峰期,主要是因为武术得到官方力量的直接干预,武术图书作为公开出版物也受到官方出版法规的管理。最显著的标志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张之江等向国民政府申请改武术为国术,从强国保种的角度加以提倡,发扬中华民族体育精神,同时创办了全国性武术专业刊物《国术周刊》,出版了大量以“国术”命名的著作和教材等。该时期以“国术”命名的著作47部,出版时间基本处于1928年中央国术馆成立以后,集中出现在1930年“土洋体育之争”时期。

(4)第四个阶段(1936—1949年)。这个阶段包括1936—1941年、1942—1946年、1947—1949年3个历

史时期,14年间出版武术著作61部,年均4.4部。这61部武术著作中有42部集中在1936—1941年出版,其他两个时期分别出版8部和11部。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土洋体育之争”之后,人们对武术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一些研究者(如章乃器、唐豪等)提出了以科学思维研究与考证武术的新方法,并撰写了大量武术著作,形成这一阶段的出版高峰。之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加剧,国家处于动荡期,受其影响,武术著作的出版数量逐渐减少。

1.2 武术著作基本符合新《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初版于1975年,1999年出版了第4版。《中图法》第4版全面补充了新主题、扩充了类目体系,使分类法跟上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提高了分类的准确性。据叶圣陶、吕叔湘在“序言”以及“出版说明”中介绍,1961年《总书目》先以上海图书馆的藏书为基础,着手编制目录草片,后北京图书馆进行整理和规划,在1978年成立了《总书目》编辑组,着手进行编纂工作^{[11]3}。以此记叙推测,《总书目》中采用的“图书分类法”最晚也应是1975年《中图法》的初版。因此,为更好地了解民国时期中国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本文以第4版《中图法》为根据,结合原有图书分类,按照中国武术主要分支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1)显示,民国时期出版的武术著作基本符合第4版《中图法》分类。

表1 1911—1949年武术著作分类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s of book classification on martial arts from 1911 to 1949

序号	分类号	分类名称	数量/部	占比/%	备注
1	G852.1	拳术	117	47.6	太极拳、长拳、南拳、形意拳、八卦掌、少林拳等
2	G852.2	器械武术	56	22.8	刀、枪、剑、棍、软器械等
3	G852.3	武术对练	—	—	
4	G852.4	武术攻防	—	—	
5	G852.5	武术集体表演	—	—	
6	G852.6	武术气功	11	4.5	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等
7	G852.9	其他民族形式体育	3	1.2	日本剑术、护身术等
8	G812.9	中国体育史(武术)	8	3.2	
9	G812.20	运动会、运动竞赛	3	1.2	世界运动会,第六、七届全国运动会等
10	其他	武术组织、理论与方法等	48	19.5	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等
合计			246	100	

注:“—”表示无此类别图书。

1.3 以上海为中心汇聚核心出版单位

1911—1949年,全国出版武术著作具有明确出版

单位信息的共73个(其他有22部是个人出版,无明确出版单位的13部)。在这73个出版单位中,出版地位

于上海的有46个,北京8个,南京5个,天津4个,济南3个,青岛3个,杭州2个,苏州2个。核心出版单位集中于上海,主要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被迫开埠;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近代出版业快速发展。例如,1895—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共创办报刊40种,在上海出版的就有27种^[16]。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里程碑——商务印书馆也是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各出版社的出版情况,借用普莱斯核心作者计算公式:

$$M_p = \sqrt{N_{\max}} \quad (1)$$

其中, N_{\max} 表示出版数最多的出版单位, M_p 表示核心出版单位。结果显示,出版著作最多的为大东书局(28部),代入公式计算得出,出版4部及以上为核心出版单位,具体为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武侠社、世界书局、正中书局、上海国术馆、新亚书店、中国健学社、国术统一月刊社、精武体育会、中国武术学会、中央国术馆,共计13个单位。另外,其他60个单位出版了112部著作,其中,武学书局、至柔拳社、中西书局、国光书店各出版3部,南洋官书局和中西书局各出版译著1部。依据统计数据和出版单位的性质,可以将这些核心出版单位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官营和民营出版书局(馆),如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等。这类出版机构出于商业目的,主要出版一些有影响力的作者(如姜容樵、褚民谊、王怀琪等)的图书,在内容上也更倾向选择便于民众练习的武术技术类图书。第二类是民间武术研究组织(社团),如武侠社、中国健学社、精武体育会,以及具有官方性质的国术馆等。这些组织以私人拳社居多,主要出版内部成员的著作,如至柔拳社只出版了陈微明的著作。虽然第二类出版单位的权威性弱于第一类出版单位,而且在作者的选择上还带有一定的偏私性,但从统计数据可见,在全部出版单位中,第二类的占比远高于第一类,如13个核心出版单位中第二类占8个,而且在其他60个出版单位中第二类占比更高。诚如任鸿隽所言:“学术的理想交通工具,不外两种:一是刊物,一是集会。”^[17]在民国时期,大量民间武术研究组织(社团)的出现对促进武术著作的出版、发行以及学术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1.4 图书作者整体分散而核心作者群集中

在文献分析中,从文献作者研究文献与作者之间

的关系是文献计量学的重要内容^[18]。《总书目》(教育·体育册)收录的著作中第一作者111人,第二作者20人,以单位名称出版的集体作者25个。根据文献计量法,作者的发文量或出版数量是指在某个时段内在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或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数量,这是衡量一个作者对出版事业贡献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依旧按照普莱斯核心作者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为3部及以上为核心作者。个人核心作者为:王怀琪15部,金一明14部,姜容樵11部,唐豪11部,吴志青10部,程冲斗7部,孙禄堂、朱鸿寿各5部,陈微明、吴图南、褚民谊、马良各4部,邓德达、顾舜华、郭粹亚、金惆生、金铁盒、张之江、陈铁生、朱霞天各3部。以单位出版的核心作者为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

郑大华^[19]认为,“我们研究民国思想文化,离不开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学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独有的风景”。受此启示,当下梳理民国时期武术著作呈现出的学术特征也离不开对作者群体的分析。通过对核心作者信息的检索和比对,发现民国时期个人核心作者群大体上可分为3类:①职业武术家(如孙禄堂、吴图南等);②参政官僚(如张之江、马良、褚民谊等);③议政的文化学者(如陈微明、唐豪等)。对于后两类作者而言,即使他们撰写出版了大量武术著作,有习武经历或与武术有一些联系,但均不以武术为业,属于当时的社会精英群体。由此看出,武术发展至民国时期,其已不仅是一项身体技艺,更是一种复合的文化事项,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如单从中国武术理论的发展来看,多类型的作者群体极大地助推了武术研究专业化发展,促成了民国时期武术独有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

此外,虽然有些作者未进入核心作者群,但其著作在中国武术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李影尘编著的《国术史》(浙江国术馆,1932年)为第一部武术专门史,分9章记叙各种拳术的渊源,虽内容缺乏翔实的考究,却开启了武术专史的书写范式。又如章乃器,他被称作“我国对武术进行科学思维的先行者”^[20],在1928年著《内功拳的科学基础》(新评论社,1928年),后于1935年修订,易名为《科学的内功拳》(生活书店,1936年)。该书是民国时期武术著作中首部借用生理学知识对“内功拳”(章乃器对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等内家拳的总称)进行解释,并指出了“气沉丹田”“松”“无极”等生理学含义的图书,其最大贡献在于开

创了民国时期武术“以科学整理旧学，以知识解释经验”的现代化研究范式，并以科学的立场批判了蒋维乔、刘仁航等静坐的“玄学论”，在当时武术界乃至文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有报纸称该书为“悉以生理学、物理学及辩证法等学理，予内功拳以新估价，开国术界之新纪元，为病夫辟一健康之捷径，极受世人之重视”^[21]。

2 民国时期武术著作的学术特征

一代有一代的学术。民国时期的武术著作之所以独具特色，在于它既不同于明清时期武术的特点，又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术风貌，而这一切的形成都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有着直接关系。短短38年的民国史，在政治上以共和制翻开了中国新的历史篇章，在文化学术上则以新文化运动终结了传统的儒学意识形态，将晚清出现的从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型确立为正统^[12]。在此时代背景下，民国时期的中国武术也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期，中西新旧的冲突与融合是这个时期武术著作最显著的学术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2.1 继承发展明清武术的书写传统

周伟良^[22]指出，“中国传统武术的基本理论体系，是在明清时期得以构建的，人们常说的传统武术的基本命脉，也是在这个时期孕育生成的”。承接晚清而来的民国时期武术，在理论发展上自然受到明清武术的影响。根据笔者统计，清末武术家及其再传弟子在核心作者群中占有较高比例。他们在传统武术师徒伦理的规训下，对于“著书立言”表现得较为慎重，著者也多表述为“述而不作”以示对前人著作的尊重和敬畏。如孙禄堂在《形意拳学》^[23]⁵自序中说道：“余习艺四十余年，不揣固陋，因本闻之吾师所口授暨所得旧谱加以诠释，盖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因此，在书写方式上赓续明清武术著作的传统，并根据时代需求扩充新内容，成为民国时期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学术特征。

2.1.1 拳种研究更加细微，普及传播武术

据《中国武术史》^[15]²⁴⁵载：“明代开始，中国武术开始形成流派或门派。”进入清代后，武术与传统文化的融摄更为广泛，出现了以传统哲学名词命名，并以哲理阐发拳理的拳术和拳派，如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明清武术著作中大量关于拳种门派的著述促进了武术理论的发展。民国时期武术延续明清武术的学术

传统，此类研究依然很多且研究更加细微，形成的著作以简介和图说“技艺”为主，重在推广普及。据统计分析，231部有页码标注的武术著作的平均页数为45页，多有绘图，图文并茂的内容有助于读者参阅和练习。如朱国福著《形意六合拳撮要》(上海武学会，1929年)，分4篇，介绍五拳、五行生克、五行合一连环拳及六合长拳，有拳式图片75幅。吴志青著《赵门拳法炮拳图说》(大东书局，1931年)，介绍长拳、炮拳，分2章：第1章绪论介绍宗派之源、异同和对长短拳界说的研究；第2章图说介绍该拳18段72式的术名、用法等。再有赵连和授、陈铁生述《合战》(商务印书馆，1931年)，介绍合战第1至6路动作，附图说明。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器具”(指一切与武艺相关的兵杖器物等^[24])的著作，此类著作以姜容樵和金一明为代表，如：金一明《龙形剑》(新亚书店，1932)、《风波棍》(新亚书店，1932)、《单戒刀》(新亚书店，1932)；姜容樵《写真太师虎尾鞭》(世界书局，1930)、《写真八卦奇门枪》(世界书局，1930)；等等。

2.1.2 融合创新阐发拳理，丰富武术理论

在明清武术理论著作中，王宗岳所著《太极拳论》被奉为武术拳法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的典范。民国时期武术著作依然延续《太极拳论》的写作范式，以中国传统周易之理、阴阳五行学说等古典哲学来阐发武术拳械理法，并融入作者对拳理的见解，从而丰富了武术理论。代表性作者有孙禄堂、陈微明、陈鑫、王芗斋等。孙禄堂以《形意拳学》(编者刊，1915年)为始端，后又陆续撰写了《八卦拳学》(1916年)、《太极拳学》(1919年)、《拳意述真》(1923年)等理论著作，在民国时期武术学术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尤其是1915年出版的《形意拳学》，作者依据旧谱加以诠释，借易理阐发形意拳拳理，贯通古今形成了形意拳理论与技术体系。陈微明对其评价：“形意有往体有来体，于顺中而求逆，一屈一伸，不运气而气充，不加力而力无穷，究其功之所至，合阴阳，参造化，而与太极同体，故先生是书，首论太极之体。”^[23]³这部著作奠定了孙禄堂创立“孙氏形意拳”的理论基础，开创了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拳法义理研究的先河。

陈微明为前清文举人，著有《太极拳术》(至柔拳社，1925年)、《太极问答》(至柔拳社，1929年)、《太极剑》(至柔拳社，1928年)等，其深厚的文化学养对促进太极拳拳理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陈鑫为陈氏太极

拳传人,代表作《陈氏太极拳图说》(开明书局,1933年)成为陈氏太极拳的理论典范。王芗斋为大成拳名家,据李洋^[25]考证“留下了《意拳正轨》《拳道中枢》《拳经述径》等多篇拳术著述。其拳术著述不循持常理,间或与中国传统武学相接轨,但又超越传统武学‘困厄’,与现代思想相接洽,颇有诸多新意”。

2.1.3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书写真实武术

受明清考据学影响,民国时期武术也形成了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研究的著述,代表性学者有唐豪、徐哲东、卞人杰等。溯源中国文化史可知,考据学是明清学术领域的重要成就。柳诒徵^[26]言:“清中叶,考据之学兴,当时号为汉学。”当时的文化学界形成了“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27]的学术主潮。李帆指出:“五四后的民国学术史,考据学在文史学科仍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28]在此学潮的影响下,为破除中国武术长期以来假托“传说”“仙人”为自家拳种门派增加神秘色彩,并与一些民间教门、秘密会社结合以招揽门徒、迷惑民众的现象,以唐豪、徐哲东为主要作者,凭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出版了一系列考据武术拳种历史、对传统武术文献校勘的著作,对辨明拳种门派的真伪、剔除武术中的迷信色彩、唤起国人对武术正确的认知发挥了巨大作用。

唐豪自 20 世纪 30 年代投入中国武术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先后撰写了《少林武当考》(中央国术馆,1930 年)、《太极拳与内家拳》(上海武学会,1930 年)、《内家拳》(中国武术学会,1935 年)、《戚继光拳经》(上海国术馆,1936 年)、《行健斋随笔》(上海国术馆,1937 年)、《中国武艺图籍考》(上海市国术协进会,1940 年)、《中国民族体育图籍考》(上海市国术协进会,1940 年)、《少林拳术秘诀考证》(上海市国术协进会,1941 年)等十余部著作和少量论文。徐哲东著有《国技论略》(商务印书馆,1929 年)、《太极拳谱理董辩伪合编》(正中书局,1937 年)、《太极拳考信录》(正中书局,1937 年)等。唐豪等人的著作对启蒙中国武术文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几年在马明达等学者的倡导下,学界已对中国武术古籍文献的整理有所重视。如:齐鲁书社分别于 2015 年和 2022 年出版了马明达主编的《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上下辑);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整理出版了《武术古籍珍本文库》《老拳谱辑集丛书》等。此外,周伟良^[29]、马廉祯^[30]等陆续发表了关于武术文献

版本、校勘的学术论文,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整体而言,中国武术文献的研究在整个武术学术体系中还较为薄弱,尚未形成与学科发展相匹配的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仍需学界予以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综上所述,尽管自民国初期武术已按照西方体育进行现代学科化改造,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一项内容,被纳入了学校教育体系,但在知识结构上,传统武术技术和理论仍然是民国时期武术课程的主要知识来源。而且,民国时期很多武术家或学者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武学功底,如孙禄堂素称武圣又深通易学,陈微明为前清文举人,唐豪为学养宏深的文史专家,徐哲东师从章太炎,等等。所以,在中国武术以西方体育为模板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明清武术的理论遗产浸润学人,成为他们据以傲视西方体育的一大优势。但客观而言,纵观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武术的理论发展,全面地学习、借鉴、吸收西方体育思想和理论一直是主流。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民国时期武术著作的发展在整体上以新胜旧,甚至以西贬中,传统武术学术资源的开掘也受到了限制和贬损。

2.2 学习借鉴西方体育的研究方法

民国时期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从国民改造的立场发起了思想革命——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代替古文的“新文学运动”为始端,在不同的文化层面爆发了一次次新旧、中西的争辩。其争辩的结果如任剑涛^[31]所言:“从‘变器不变道’演进‘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内部关乎中西之争的最后结论,还是潜心学习西方的主张绝对占了上风。”这一时期中西体育之争作为文化之争的组成部分,无论是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旧体育之争”,还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土洋体育之争”,其争论的结果都进一步加速了以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体育向西方体育学习的步伐^[32]。

2.2.1 参照西方体育著作革新中国武术

民国学人对西学趋之若鹜,西学成为他们战胜传统学术的有力武器。因此,自清末民初西方体育引入中国以来,整个民国时期都将“引鉴、学习、模仿”西方体育作为快速实现中国武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1)直接翻译西方体育著作,并以此为参照,编写新的武术教材或著作。如日比野雷风(日)著、汉魏译《剑武术》[又称《武道根本》(南洋官书局,1911 年)]是

民国时期最早的一部武术译著。又如:王怀琪、吴洪兴直接取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克罗密所著 *Singlestick Drill*, 编译成《手仗自卫术》(中国健学社, 1929 年); 查瑞龙参照西欧拳术编著了《新技击》(编者刊, 1940 年)。还有一些直接翻译的日本柔术、西洋拳术(击)的著作, 成为学习西方拳术的教材。如陈霆锐译《西洋拳术》(中华书局, 1917 年)、王学政译《拳击家的锻炼》(商务印书馆, 1940 年)、徐卓呆译《日本柔术》(中华书局, 1917 年)、殷师竹译《柔术入门》(武侠社, 1933 年)等, 这些译著多有图表, 多部被再版, 传播较广。

(2)以西方体操(兵操)为模板, 编写简化武术和拳操教材, 创新武术形式。代表性作者有朱鸿寿、徐愚忻、马良、褚民谊、王怀琪、吴志青、顾舜华等。据笔者考证朱鸿寿编著的《拳艺学初步》(商务印书馆, 1911 年)是民国时期最早仿效西方体操的方式编辑而成的近代武术教科书。之后, 马良在 1917—1921 年陆续出版了《中华新武术》(上篇)的《拳脚科》《卒角科》《棍术科》《剑术科》4 部著作。因马良自身为民国军界高官, 且每部教程都有当时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如段祺瑞、梁启超、冯国璋、蔡元培等)题词作序, 所以《中华新武术》系列教程一经出版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影响较大。从学术上看, 《中华新武术》系列教程是中国武术在军事体育思想的影响下“兵操化”的改造成果; 在书写方式上, 其开启了模仿西方学科分类体系编写的新范式, 是中国武术近代化转型的初步尝试, 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 欧美自然主义体育思想被引进, 军事体育思想被替代, 《中华新武术》失去了理论基础, 又因宣传封建复古思想阻碍了新文化运动进程, 受到鲁迅等学者批判, 由此开始没落。

(3)褚民谊以《太极操》(大东书局, 1932 年)为始端, 开创了民国时期“简化太极拳”系列著作编写的先例。其书中述道:“太极操脱胎于太极拳而较简易。”全书分 9 节, 论述太极操的原理、作用、练习法等(书中有蔡元培等的题字、李煜瀛等 6 人序跋), 受到吴图南、徐致一等人的赞赏, 成为民国时期太极拳发展的一种潮流。据蔡宝忠^[33]考证, “在第二次国术国考中, 褚民谊倡导‘健身第一’的公平性与张之江主张‘真功实力’的放开打形成冲突”, 即张储“拳械对试”之争^[34], 引发了当时各界关于国术“是打还是演”的争论。但

随着国术馆的衰败, 争论最终也没形成定论, 成为中国武术学术史的遗留问题。此外, 另具代表性的作者是王怀琪, 他在民国时期著作最多, 其以融合体操动作和教法, 运用体操术语、口令、练习方法对中国传统拳术(如脱战拳、谭腿)、健身旧法(如八段锦、易筋经、五禽戏)进行再编或新编, 代表作有《八段锦》(中国体操学校, 1916 年)、《分级八段锦》(中国健学社, 1926 年)、《新编八段锦》(大东书局, 1941 年)等。

2.2.2 以科学实证思维探究中国武术

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观念强势冲击了中国旧式学术体系, 以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等文章为标志, 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思潮”为纲领形成新的研究范式^[35]。这一思潮不仅引发了“新旧体育之争”的辩论, 而且掀起了当时国人以科学的方法, 从中西合璧的角度阐明武术“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热潮, 以此回应西方体育界对中国武术“不科学”的质疑。如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 一些来华的西方体育家(如麦克乐、葛雷等)曾讥中国武术只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36], 受此影响, 吴蕴瑞等^[37]发表“现在国术之材料, 尚未经科学之研究, 教学之方法, 尚未有心理之根据”等观点。为此, 这一时期的武术著作不仅直接以“科学”命名, 在内容上更是强调实验与观察, 追求理论的“实证性”。代表性著作如吴志青的《科学化的国术》(大东书局, 1930 年), 依据生理、心理及教育学原理, 编成动作(四肢、改正、上肢、腰胯、快速、舒缓、呼吸运动等), 并附图加以注解, 作者坚信“科学化”是发扬国术的根本方法, 认为“今昔时势不同, 现为文化进步, 科学剧变时代, 故国术一道, 脱不以科学方法, 从而改进, 势难邀社会之信用, 必致完全失传”^[38]。再如章乃器的《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新评论社, 1928 年)、《科学的内功拳》(生活书店, 1936 年), 后者为前者修订版, 两部著作主要论述了内功拳的本质以及锻炼身心的功效等。吴图南著《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商务印书馆, 1931 年), 对太极拳的拳势进行说明等。

另外一些著作虽未直接用“科学”命名, 但使用了表示科学性的词汇如“健康”“实验”等。如: 沙古山《国术与健康》(中华书局, 1941 年), 全书分“国术与人体各器官的健康”“国术与外科”2 个篇章; 朱鸿寿著《实验拳法讲义》(中华书局, 1917 年); 徐致一著《太极

拳浅说》(太极拳研究社,1927年),分9章介绍了太极拳的源流、优点,太极拳与心理学、生理学、力学的关系以及练习方法等。

由此看出,民国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在历经清末新政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普遍接受了“科学”的概念和“科学救国”的思想,“科学”成为他们实现中国武术现代化的有力武器。在学术实践上,他们将融入现代学科的理论(如生理学、心理学、医学等)视为民国时期武术著作“新”的关键,并且对西方研究范式多持融会与创新的态度,敢于改变传统武术著作的书写范式,由此奠定了中国武术现代学科化发展的基础。

2.2.3 突破传统观念桎梏,关注女性群体

吴永贵^[39]指出,“在近代民族御侮自强的思考和行动中,有两类社会人群受到特别关注:一是妇女;二是儿童。女性杂志和儿童刊物的大量出现,凸显了这种关注,它表明以往传统社会和观念中长期处于弱势或被忽视的社会群体,获得了新的身份定义和性质变化”。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武术著作也出现了关注女性群体的倾向。吴志青所著《六路短拳图说》(大东书局,1931年)重点强调了“适合女子练习”。滕学琴编著的《女子拳法》(中华书局,1917年)更具代表性,其是收录的图书中唯一一部专门为女性编著并以女性命名的武术著作。该书1917年1月出版,1929年4月4版,126页,有图,32开。全书分2篇介绍了女子拳的步法、手法、步位、姿势以及桩手、操手的演习方法。这部著作的出现以及再版反映了民国时期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新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于女性参与武术运动认知的改变,以及武术研究主动向“科学”“民主”靠近。

总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导致了中国社会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断裂,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西方体育得以向中国武术提出了重新建构与传统迥然不同的全新形态的要求。除了一些新颖的运动项目外,更重要的是近代西方体育建立了以近代自然科学(如生理学、解剖学等)以及社会科学(如管理学、社会学等)为理论根基的学科基础,相比起源于传统农耕文化的中国武术而言,充分展现了西方体育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在西方体育学者的鼓吹下,西方体育成为“科学”“民主”的代名词,以绝对的理论制高点对中国武术持批判态度。因此,激发了一些学者(如唐豪、吴志

青、章乃器等)从不同方面对中国武术进行研究的热情。通观民国时期的武术著作,无论是延续明清考据学对中国武术历史进行考证,抑或运用西方学科知识对中国武术进行理论分析,其实质都是为了回应西方体育带来的冲击,在理论上求得两者的互相印证,并以此来证明中国武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20世纪初,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已经谈不上“平等对话”,民国学人所做的无非是在西方提供的各种思想和主义下进行选择。所以,民国时期参照西方体育的武术著作虽多,但大部分只停留在学习、借鉴、模仿西方体育的初级阶段,真正能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并对西方体育产生影响的学术著作甚少。可以说,时至今日,这种学术境况仍未得到完全改变,中国武术的学术著作仍然缺少主体性、原创性的学术理论,具有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3 结束语

本文从图书分类、出版趋势、作者群体等多个方面对民国时期武术著作进行了统计分析,并结合宏观历史背景剖析了武术著作所呈现的学术特征。尽管从出版数量上看,由于民国历史较短,加上社会动荡、政局不稳,武术著作的成果总量有限,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民国时期武术著作形成了很多开创性的学术范式,初步描绘出中国武术学术未来发展的方向。具体而言,民国时期武术学术价值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不同于传统,也区别于现代,处于新旧转换、中西融合的过渡期,“是各种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40],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本文以文献为基础,描述了民国时期武术学术的演进过程,厘清了民国时期武术著作的学术遗产,这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清晰、细致、客观地了解民国时期武术学术的发展状况,而且对推进当下中国武术学术的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学术体系和自主性知识体系具有理论参考价值。

作者贡献声明:

陈保磊:提出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框架,搜集统计数据,撰写、修改论文;
王 岗:论证选题,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参考文献

- [1] 林伯原. 民国时期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J]. 体育文史, 1994(3): 14-15
- [2] 易剑东. 民国时期武术竞技述论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5, 21(3): 7-12
- [3] 马明达. 应该重新审视“国术” [J]. 体育文史, 1999(5): 35-37
- [4] 吉灿忠, 孙庆祝. 民国《大中小学国术课程标准》及其当代启示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6, 40(2): 46-50
- [5] 刘靖. 中央国术馆研究: 组织社会学的视角 [D].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2013
- [6] 孟欢欢, 李健, 李凤梅. 近代精武与当代精武组织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J]. 体育文化导刊, 2017(9): 156-160
- [7] 董刚, 金玉柱, 陈保学, 等. 民国时期中国武术的身体政治逻辑及其现代意义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1): 63-70
- [8] 李源, 黄贤秀, 梁勤超. 中国近代武术家群体形象研究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7(6): 55-61
- [9] 葛兆光. 余音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7
- [10] 周庆杰. 民国时期太极拳著作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价值研究 [J]. 体育科学, 2008, 28(2): 68-72, 92
- [11] 北京图书馆. 民国时期总书目: 教育·体育: 1911—1949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 [12] 欧阳哲生. 民国学术之历史定位 [J]. 史学理论研究, 2020(1): 4-8
- [13] 马良. 华北方武术体育五十年余纪略 [J]. 体育与卫生, 1924, 3(3)
- [14] 陈公哲. 精武会50年 [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 5
- [15]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7
- [16] 张仲礼.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4
- [17] 左玉河. 中国科学社与民国学术体制之创建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4): 193-198, 2
- [18] 邱均平. 文献计量学 [M]. 2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209
- [19] 郑大华. 要重视对民国学人群体的研究 [J]. 史学理论研究, 2020(1): 20-23
- [20] 徐才. 武术学概论 [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6: 196
- [21] 新北. 章乃器与内功拳 [N]. 商情日报, 1936-12-03(4)
- [22] 周伟良. 古代武术的历史分期及其基本特征研究 [J]. 中华武术(研究), 2012, 1(7): 14-35
- [23] 孙禄堂. 孙禄堂武学集注 形意拳学 [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 [24] 马明达. 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编: 上辑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5: 22
- [25] 李洋. 王芗斋武术人生与拳术思想之研究 [D].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2018: 6
- [26]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 上下册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864
- [27]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M]. 新校本. 夏晓虹, 陆胤, 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2
- [28] 孙本文. 社会学原理: 上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7: 20
- [29] 周伟良. 《少林寺拳术秘录》外一种 [J]. 中华武术, 2022(6): 36-37
- [30] 马廉祺. 明代高颖《武经射学正宗》版本源流与价值研究 [J]. 体育科学, 2021, 41(5): 53-62
- [31] 任剑涛. “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 [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49-68
- [32] 王岗, 陈保磊, 丁昊阳. 对中国武术学科“三大体系”建构的理论之思 [J]. 体育科学, 2022, 42(10): 28-34
- [33] 蔡宝忠. 对近代中国武术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重新认识 [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3, 25(6): 494-500
- [34] 罗时铭, 崔乐泉. 中国体育思想史: 近代卷 [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68
- [35] 张越. 由史学转型看新文科视野下的学科建设 [J]. 探索与争鸣, 2021(10): 30-33
- [36] 周伟良. 中国武术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115
- [37] 吴蕴瑞, 袁敦礼. 体育原理 [M]. 上海: 勤奋书局, 1933: 180
- [38] 吴志青. 科学化的国术 [M]. 上海: 大东书局, 1931: 11
- [39] 吴永贵. 中国期刊史: 第二卷: 1911—1949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6
- [40]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34

(下转至第 63 页)

famous hurdle coach in China, are studied with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UN Haiping established two core principles of static control of technical movements and integrated training system. He designed training plans of "double peak" mode, prominent four-stage target, "jagged" load characteristics and "10-day mode" in the annual cycle, meso-cycle, micro-cycle and pre-competition preparation, respectively. He regarded neural-muscle system excitability as the core of hurdling speed training, advocated using the "long-short" combination method to improve hurdling cycle speed, utilized resistance running and assistance running to break through speed barriers. Also, he emphasized the integration benefits of individual exercise movements and set personalized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programs. In addition, he used a "heavy-light" load combination strength training to develop fast power and focused on specialized strength training. SUN innovated personalized strength exercise methods, implemented personalized technical diagnosis, optimized personalized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used varied training scenarios to enhance athletes' psychology.

Keywords: SUN Haiping; hurdle; personalized training; training philosophy; training practice

Authors' addresses: 1. Sports Big Data Research Center,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2. Hubei Province Sports and Health Innov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3. Athletics Center, Shanghai No.2 Sports School, Shanghai 201199, China; 4. Sports Training Research Center,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

(上接第 51 页)

How Was Wushu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ritten About?: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Works Published in 1911–1949

CHEN Baolei^{1,2}, WANG Gang^{1,3}

Abstract: With 246 Wushu (martial arts) works and 156 authors published from 1911 to 1949 as materials, the book classification, publishing trend, author composition and other aspects are analyzed. It is found that the Wushu works in this period intuitively show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s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hanghai is the center to gather the core publishing units,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scholars constitute the core author group". Under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Wushu theori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filtrated scholars, leading to the publication in a large quantity of works on "boxing", "boxing theory" as well as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Wushu origins, which continued the writing of the tradition of Ming and Qing Wushu, and expanded the new content as well. Under the demand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science" and "democracy" became the them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becoming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ushu academic works; Chinese martial art;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cademic history

Authors' addresses: 1. School of Wushu,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ilitary,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Zhejiang, China; 3.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hysical Behavior and Health Promotion, Wuhan Sports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